

郭璞诗赋研究

赵沛霖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璞诗赋研究

赵沛霖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璞诗赋研究/ 赵沛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61-6568-3

I. ①郭… II. ①赵… III. ①郭璞(276~324)—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08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郭璞詩賦研究

——
作者手迹

目 录

第一章 郭璞生平	(1)
第一节 郭璞生平若干史实考辨	(1)
一 关于郭璞隐居青溪山的时间	(2)
二 郭璞隐居的青溪山究竟在湖北临沮还是在 河南登封?	(5)
三 郭璞与丞相王导的关系及其为皇帝直接效命的机缘	(9)
四 占卜生涯对郭璞人生态度和人生道路的影响	(11)
第二节 郭璞的神仙道教信仰	(15)
一 郭璞对于神仙道教的思想认同	(15)
二 郭璞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20)
三 小结和说明	(26)
第三节 尸解升遐:郭璞之死解读	(27)
一 政治、宗教背景	(30)
二 郭璞荒诞乖谬之言行	(33)
三 宗教动机——内在驱动力	(36)
四 小结与其他	(41)
第四节 郭璞的生平简历和特色人生	(43)
一 郭璞生平简历	(43)
二 郭璞人生的重要特点	(47)
第二章 郭璞的诗歌之一:《游仙诗》	(49)
第一节 《游仙诗》研究历史的教训和启示	(53)
一 《游仙诗》内容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53)
二 《游仙诗》研究历史的教训和启示	(55)

第二节 “序诗”:全诗的思想基点和思想指向	(65)
一 两种对立的人生价值取向的抉择	(66)
二 走隐遁之路,与入世观念彻底决裂	(72)
三 序诗的意义及其与正文之间的关系	(73)
第三节 学道修仙的原因和思想基础	(75)
一 生命悲剧及其带来的焦虑和痛苦	(75)
二 探索和寻求摆脱生命悲剧的途径	(79)
三 对于学道修仙之路的肯定及其原因	(83)
第四节 神仙世界与宗教存想	(85)
一 通过宗教存想而出现的神仙世界之一	(86)
二 通过宗教存想而出现的神仙世界之二	(91)
三 第三、九这两首的共同点与具体差别	(96)
第五节 第二、六、八、十首诗解析	(100)
一 第二首:学道修仙之始——山林隐逸	(100)
二 第六首:以历史题材表现对学道修仙的观点和认识	(107)
三 第八首:修德悟道	(114)
四 第十首:修炼成仙,赴神仙世界	(119)
第六节 《游仙诗》内容的构成和段落划分	(124)
第七节 《游仙诗》是学道修仙历程的“自叙” ——《游仙诗》的主题及其思想特征	(126)
第八节 《游仙诗》的结构特点	(135)
第九节 关于方术修炼的艺术处理	(140)
一 关于静啸、服食、行气和服炼津液的艺术处理	(141)
二 关于存想幻视所见神仙世界的艺术处理	(146)
三 小结	(150)
第十节 《游仙诗》对中国诗歌史的重要意义和贡献	(151)
 第三章 《游仙诗》残句的性质与价值	(157)
第一节 正确认识《游仙诗》残句的前提	(158)
第二节 《游仙诗》残句内容分析	(160)
一 残句一、二、三	(160)
二 残句四	(165)

三 残句五	(166)
四 残句六、七、八	(167)
五 残句九	(169)
六 残句十、十一	(170)
七 残句十二	(171)
第三节 结 论:《游仙诗》残句的性质、特点和重要价值	(172)
第四章 郭璞的诗歌之二:颂歌和赠答诗	(177)
第一节 一首富于时代特征和人生悲情的颂歌——	
《与王使君诗》	(177)
一 结合历史巨变赞颂王导功德	(179)
二 结合个人遭遇,寄托人生悲情	(182)
三 强烈的君权至上观念和君权神授观念	(184)
四 艺术表现特点和成就	(185)
五 小结	(188)
第二节 赠答诗	(189)
一 《赠温峤诗》	(190)
二 《答贾九州愁诗》	(191)
三 《答王门子诗》	(193)
四 《赠潘尼》	(194)
五 小结	(195)
第五章 郭璞的辞赋	(198)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与《江赋》	(199)
一 前人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200)
二 《江赋》是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特定 背景下的产物	(203)
三 长江的艺术形象及其意义	(206)
四 作者对东晋君臣所寄托的希望	(211)
五 长江孕育了崇高的道德精神	(217)
六 结构安排的得与失	(220)

第二节 关于《客傲》	(223)
第三节 辞赋残篇	(228)
一 《蜜蜂赋》	(229)
二 《蚍蜉赋》	(230)
三 《井赋》	(230)
四 《巫咸山赋》	(232)
五 《盐池赋》	(232)
六 《流寓赋》	(233)
七 《登百尺楼赋》	(235)
八 《南郊赋》	(237)
第四节 小结	(238)
结语	(242)
附录	(247)
后记	(249)

第一章 郭璞生平

第一节 郭璞生平若干史实考辨

郭璞是魏晋时代一位享有“中兴第一”^①美誉的著名诗人和辞赋家，其作品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关于他的生平经历，人们不但知之甚少，而且存在很多模糊不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被完全忽略，或见解不一却又缺乏深入研究，往往令人莫衷一是。

有关郭璞生平的文献，除《晋书》本传之外虽还有一些，如《建康实录》《世说新语》《荆州记》和《洞仙传》等，但其文献意义都十分有限：《建康实录》的几则资料一无例外都是关于占卜的事例，而没有提供其他更有价值的信息；《世说新语》《荆州记》关于郭璞的记载都只是片言只语，^②而未能提供更多的资料；《洞仙传》除了几则占卜事例之外，主要是在说明郭璞名著仙籍，已经成为神仙，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内容多与本传重复。资料的缺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郭璞生平资料最主要根据的本传却并不完全真实可靠：房玄龄等人修《晋书》，特别是《郭璞传》，其中掺杂了很多怪诞的传说和逸闻故事，“这些故事不但情节难以置信，连据此推测郭璞的行踪，也往往不可靠”^③。以上两点成为郭璞生平研究的最大的不利条件，影响和制约着郭璞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如此，但并不意味着在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在郭璞生平研究方

① 钟嵘：《诗品·晋弘农太守郭璞诗》，参见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第247页。

② 《世说新语》注还引用了《郭璞别传》等佚书资料。

③ 曹道衡：《〈晋书·郭璞传〉志疑》，参见《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6页。

面就不能有所作为。众所周知,历史有三重性,主要体现为历史的三种形态:客观存在的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和学者研究的历史。前二者,即客观存在的历史和文献记载的历史都是凝固的已然事实,除非发现新的资料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但是在学者研究的历史方面却是大有可为,诸如辨别史料真伪,评断人事是非,整合历史碎片,彰显潜隐史实,等等。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学者研究的历史对于克服上述不利条件,进而推进有关研究方面可能会起到某些作用,因而尤其显得重要。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于郭璞生平中的若干问题,如郭璞在青溪山隐居的时间、青溪山的地点、郭璞与东晋丞相王导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郭璞进仕的意义、终生从事占卜对郭璞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郭璞之死的性质等问题做了初步的考辨。考订和辨明有关事实和问题,得出的结论虽然未必就是定论,但起码可以促进对于有关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明辨是非,从而有助于正确认识郭璞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道路,而这对于郭璞生平和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游仙诗》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关于郭璞隐居青溪山的时间

在郭璞的一生中有过一段隐居的经历,《游仙诗》之二对这段隐居生活做了这样的描写: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翘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阖闾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关于这段隐居经历的时间,现代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以陆侃如为代表,陆氏《中古文学系年》:“吴士鉴、刘承幹《晋书斟注》卷七十二:‘……庾仲雍《荊州记》曰:临沮县青溪山,山东有泉;晋郭璞为临沮长,常游此。赋《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即此也。’案璞为临沮长,不见于传,当在过江之前。今假定在师郭公后五年左右。”^①据《晋书》本传,郭璞师从郭公学占卜之术是在晋惠帝元康五年(295),五年之后当是晋惠帝永康元年(300),据此,

^①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793页。

陆氏将郭璞在青溪山隐居的时间系于晋惠帝永康元年（300）。

另一种意见认为郭璞隐居青溪山是在他任临沮县令期间，时间“是在郭璞为王敦记室参军时”^①。郭璞任王敦记室参军的时间是太宁元年（323），即郭璞被王敦杀害的前一年。

以上关于郭璞在青溪山隐居时间的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

前一种说法不能成立的原因十分明显：从上面所引《中古文学系年》的论述可以知道，陆氏的论断即郭璞在青溪山隐居是在晋惠帝永康元年，完全是根据庾仲雍《荆州记》的一段文字做出的，但这段文字只是说明了郭璞在任临沮长时，常游青溪山，即使这就是所谓的隐居的话，也仅仅是说明在此隐居而已，而根本没有涉及隐居的时间，更没有说明或暗示是在晋惠帝永康元年隐居，此其一。其二，陆氏可能是知道找不到任何根据，所以结论只能这样表述：“今假定在师郭公后五年左右”，并据此得出了郭璞在青溪山隐居是在晋惠帝永康元年的结论。可见，陆氏的结论仅仅是一种假定的推测之词，而不是严谨的科学论证，此其二。其三，再说陆氏据以推论的“根据”，即“庾仲雍《荆州记》曰：‘临沮县青溪山，山东有泉；晋郭璞为临沮长，常游此。赋《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即此也’”。这则资料本身即存在明显的问题，与已知的郭璞的生平经历的诸多事实严重抵牾（详后），说明其本身即存在失误。正是这几个原因成为陆氏说法的致命伤，而根本无法服人。

再说后一种说法，即郭璞在王敦麾下任临沮县令期间曾在青溪山隐居。这一说法矛盾百出，同样不能成立：叛将王敦既委任郭璞为参军，又如何会容忍他去隐居？特别是在叛乱和平叛的战争一触即发，形势异常紧张的形势下，更是没有这种可能。再说，郭璞在叛将王敦营中，朝廷又怎么可能命他为县令？退一步说，即使朝廷有这样的任命，王敦也绝不可能允许他去赴任，因为郭璞在王敦与朝廷的矛盾斗争中由于站在朝廷一方早已引起王敦的强烈不满和警觉，在这种情况下，王敦怎么可能让他为朝廷效命？^②

再从《晋书》本传行文的惯例来看，这种说法更是靠不住：《晋

① 聂恩彦：《郭弘农集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

② 关于郭璞与王敦的紧张关系以及在王敦营中的危险处境，详见本章第三节“尸解升遐：郭璞之死解读”之一“政治、宗教背景”。

书》本传凡说到郭璞任何职时都有明确具体的交代，不但皇帝直接任命的著作佐郎、尚书郎等官职是如此，就是任殷祐、王导和王敦的参军这类幕僚之属的小吏也都是如此。本传这样重视所任官职，而对所任的朝廷命官临沮县令反而失声，如果郭璞果真担任过临沮县令，这岂不是自乱体例？

总之，无论从当时的形势背景和郭璞的具体处境看，还是从《晋书》的记载看，都说明这一说法纯属臆测之辞。

以上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那么，郭璞隐居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呢？

事实上，关于这段隐居经历的时间郭璞在作品中透露过，《与王使君诗》：

道有亏盈，运亦凌替。茫茫百六，孰知其弊！蠢蠢中华，遭此虐戾。遗黎其咨，天未忘惠。云谁之眷，在我命代。

遭蒙之吝，在我幽人。绝志云肆，如彼涔鳞。灵荫谬垂，跃我龙津。翘情明规，怀德鉴神。虽赖暂盼，永愧其尘。

王使君即在东晋王朝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丞相王导，此诗是郭璞献给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王导的颂歌。全诗共五章，这里引录的是第一、四两章。第一章开头四句中的百六，即厄运、灾难，句中指造成历史大劫难的永嘉之乱。这四句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说明兴衰治乱的交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但神妙莫测的厄运突然降临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还是令人震惊。第四章写自己在这场历史灾难中的不幸遭遇和对王导知遇之恩的无限感念。其中前两句“遭蒙之吝，在我幽人”写的正是自己隐居经历与这场历史大劫难的关系，是说自己正在隐居之际，适逢异族入侵之变。吝，耻辱；“遭蒙之吝”是指永嘉之乱中异族入侵为民族造成的奇耻大辱。幽人，即隐士，郭璞以隐士自称说明当时他确曾隐居。接下去的两句“绝志云肆，如彼涔鳞”是说为了躲避战乱和灾难，人们决心离开家乡犹如云散；生活困苦不堪，如同涔中之鱼陷入了绝境。^①可以看出，这两章诗虽然简短，但却为郭璞生平研究提供了确切而丰富的信息：

① 详见第四章第一节对《与王使君诗》的有关分析。

- (一) 郭璞正在隐居，否则不会说“在我幽人”；
- (二) 隐居的时间是在民族遭受奇耻大辱的永嘉之乱期间；
- (三) “避地东南”途中受尽了痛苦折磨。

简言之，郭璞在诗中的自述表明：隐居青溪山的时间就是发生在“避地东南”的途中。这样看来，前人关于郭璞隐居青溪山时间的两种说法都与作者自道的“遭蒙之吝，在我幽人”等事实相矛盾，因而都不能成立。

我们把郭璞隐居的时间锁定在永嘉之乱“避地东南”的途中，除了上面说的作品的根据之外，还可从他隐居的青溪山的具体地点得到进一步证明。

二 郭璞隐居的青溪山究竟在湖北临沮还是在河南登封？

郭璞在《游仙诗》之二中说的隐居之地青溪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对于郭璞生平研究来说，不单单是一个地理问题，而更是直接关系到郭璞生活经历和对《游仙诗》理解的重要问题，因此有必要辨别清楚。关于青溪山的具体地点主要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是在湖北临沮（今湖北南漳，一说在湖北远安。以下简称“临沮说”），此说出自庾仲雍《荆州记》，《文选》《游仙诗》李善注曾引用此说。^①

二是在河南登封（今河南登封东南。以下简称“登封说”），此说根据《仙传拾遗》关于鬼谷子隐居青溪山和《史记》的有关记载得出。^②

关于青溪山地点的上述两种说法中，我认为，“登封说”比较可信，而“临沮说”虽然由于《文选》李善注的引用而流行广泛，但却有违事实而难以服人。主要根据有三：

第一，“登封说”虽然从《晋书》本传也找不到根据，但却可以从郭璞的作品得到有力的证明：“登封说”与《游仙诗》之二的的内容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临沮说”相反，与诗义抵牾难通。

我们知道，前面所引的《游仙诗》之二，除了交代青溪山的隐居环境和隐居生活（即作品的前六句）之外，另外还写了两个内容，一个是

^① 《文选》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6页。

^② 《仙传拾遗》见《太平御览》，《史记》的有关记载见《苏秦列传》集解。

“翹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即对高士许由的仰慕；另一个是“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即对神女宓妃的向往。而这两件事中的高士许由和神女宓妃，从有关的神话传说可以知道，其出没地点都在今登封以及洛阳东南一带，与“登封说”在地理上完全一致。

先说前一事即“翹迹企颍阳，临河思洗耳”涉及的地域问题：相传，唐尧时代高士许由隐居于箕山，尧让天下于他，被他拒绝；又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认为这有辱于自己的品德，不欲闻之，便到颍水洗耳。故事表现了许由“膺膺荣利，厌秽声名”^①的崇高精神品德。从地域上看，诗人仰慕的“颍阳”和许由洗耳的“颍河”都在登封。据《登封县志》：登封古又称颍阳，因“在颍水之阳”^②而得名，而颍水的正源正是出于登封石道西的颍谷。另外，许由隐居的箕山则在登封县的南部，“颍河自西而东由箕山北面流过”^③，后折向东南流入豫东平原。

再说后一事中的神女宓妃所涉及的地域问题。相传宓妃本是伏羲氏之女，溺死洛水而为洛神。据曹植《洛神赋》：曹植是在“济洛川”、“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④之后而见到宓妃的，这说明宓妃的活动区域都在洛河下游龙门、偃师和缑氏等地，也就是登封与洛阳的交接处，即今洛阳东南和登封西北一带。^⑤

总之，前一事所涉及的“颍阳”、“颍河”、箕山和后一事所涉及的龙门、偃师、缑氏，都在登封及其与洛阳之间一带，与“登封说”所主张的诗人隐居的登封青溪山完全属于同一个地区。这就是说，按“登封说”来解读《游仙诗》之二，诗人在青溪山隐居期间，由于隐居的地点与往昔高士许由和神女宓妃出没的地点在同一地区而触动情思，引发艺术联想和想象，于是借有关的神话传说以抒怀，表现了诗人对于世俗社会的否定和疏离，对于神仙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以及无由交接神女的惆怅。这清楚体现着《游仙诗》之二各层内容之间的时空一致性和艺术形象的统一性。再看“临沮说”，按此说，郭璞隐居的青溪山远在湖北临沮，与许由、宓

① 《庄子集释·逍遥游疏》，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页。

② 《登封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③ 同上书，第945页。

④ 曹植：《洛神赋》，参见《文选》第270页。

⑤ 参见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洛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69—373页；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286页。

妃事发生的登封、洛阳一带相距超过千里，隐居于此而情志在彼，中间又没有提供任何可资跳跃的中介，因而在三层内容之间形成明显的断裂，既使行文走势不明，又破坏了时空的统一性和艺术形象的完整性。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游仙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李善所说的“璞之制，文多自叙”^①，就是说诗中所写都是作者自己生活经历的“自叙”，正是因为如此，所写的内容不但有事实根据，而且完全符合生活逻辑。而按“临沮说”，身在湖北临沮而又没有任何由头地突然驰思洛阳，那是既不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又违背了生活逻辑和艺术创作规律，因而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第二，“临沮说”与郭璞“避地东南”的行走路线相背离，而“登封说”与此行走路线相一致：前面已经证明郭璞隐居青溪山是发生在永嘉之乱“避地东南”的途中，那么，“避地东南”的行走路线也就成为确定青溪山地点的重要参照。

关于郭璞从他的家乡山西闻喜“避地东南”最后到江苏南部暨阳的行走路线，现存文献没有提供完整的资料，当代学者曹道衡先生根据本传和有关文献所提供的资料以及他的《盐池赋》《巫咸山赋》《流寓赋》和《登百尺楼赋》等早期作品，推知其行程大体如下：“他从闻喜出发，取道今运城、安邑附近的盐池……经过盐池之后，大约是在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渡过黄河，又向东到达洛阳。在洛阳……又继续向东南进发，直抵今安徽的庐江……南行过江到宣城……又沿江东下到今江苏南部，定居于暨阳（今江苏江阴东）……”^②按“临沮说”，郭璞在湖北临沮的青溪山隐居，那么其行走路线就是：离开洛阳之后先到湖北临沮，然后才到安徽庐江、宣城等地。我们知道，庐江、宣城都在洛阳的东南方向，而湖北临沮则在洛阳正南方，且洛阳在河南北部，临沮在湖北中部，两地南北遥遥相望。就是说，按“临沮说”，郭璞去庐江先向南跨越河南、湖北两省，然后再从湖北中部向东奔庐江。如此连跨两省绕行，比从洛阳向东南直接到庐江要多走一千多华里，这在缺乏便捷的交通工具，路途又十分艰险的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相反，“登封说”则根本不存在

① 《文选》李善注，第306页。

② 曹道衡：《郭璞》，参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380页。

这样的问题：如前所说庐江在洛阳的东南，而登封不但距离洛阳很近，而且恰恰也在洛阳的东南，就是说从洛阳奔赴庐江，登封是顺路的必经之地。

第三，从隐居的时间看：如前所说，诗人“避地东南”途中逗留洛阳、登封是在西晋末期，这说明，青溪山在登封之说也就意味着诗人在青溪山隐居是“避地东南”漂泊时期之事。而青溪山在荆州临沮之说则完全不同。我们知道，诗人晚年任王敦的记室参军时，王敦驻守荆州，所以主张青溪山在荆州临沮之说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诗人到过荆州是在任王敦记室参军时。而诗人任这一职务大约是在永昌二年（323），距离被王敦杀害最多也只是一年多的时间。这说明，主张青溪山在荆州临沮之说，就意味着诗人隐居青溪山是在他人生的晚期。可见，对于青溪山具体地理位置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于诗人隐居生活的具体时间和人生历程的看法。

另外，诗人任职政敌王敦麾下对他来说充满了杀机，处境十分危险（详本章第三节《尸解升遐：郭璞之死解读》）。在这样的情势下却过着悠然闲适的隐居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不止如此，魏晋时期学道修仙都是从山林隐逸开始（详后），主张青溪山在荆州临沮之说就意味着学道修仙是从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才开始，从事理上也说不通。相反，主张青溪山在登封之说则根本不存在这些窒碍。

总而言之，诗人隐居的青溪山在登封之说既有文献根据，又与其人生经历、魏晋时期的学道修仙习俗（从山林隐逸开始学道修仙）和诗歌内容相吻合，而青溪山在荆州临沮之说则不具备文献根据和这些条件，所以本文肯定了登封之说。

根据这样的认识可将诗人的这段生活经历概述如下：诗人在“避地东南”途中，经过洛阳和登封时曾在这个地区的青溪山度过了一段隐居生活，由于隐居的地点与传说中的高士许由和神女宓妃出沒的地点相接近，而触动情思和联想，于是借往事以抒发其内心情志，生动真实地反映了隐居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变化。青溪山隐居生活结束以后，郭璞继续向东南出河南而到达庐江。

除以上三点之外，还有一点应当提到：“临沮说”主要是根据庾仲雍《荊州记》所谓的“郭景纯尝作临沮县”推演而来，而作为立说基础的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临沮说”不但于文献无据，而且谬误明显又

十分离奇。之所以如此，我认为《荆州记》的这段文字可能存在错讹。这段文字全文如下：“临沮县有青溪山，山东有泉，泉侧有道士精舍。郭景纯尝作临沮县，故《游仙诗》嗟青溪之美。”文中的郭景纯即郭璞，实际应为其父郭瑗，即本应作“郭瑗尝作临沮县”。根据如下：

如前所说，郭璞既没有可能到荆州临沮，更没有可能任临沮县令；而其父郭瑗却完全有这种可能。《晋书·郭璞传》：其“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终于建平太守。”^①晋时建平为郡，属荆州，据《晋书·地理志》：“荆州统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门、长沙……始安十五郡。”^②郭瑗“终于建平太守”是说建平太守是他一生升迁的最高官职，郡太守下为县令，而临沮县即在荆州，这说明郭瑗是完全有可能从临沮县令（或还经过其他官职）而升迁为建平太守的。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的话，就是说郭瑗曾任临沮县令，而“瑗”、“璞”二字都从玉，声符形又相近，是很容易错“瑗”为“璞”的。而这一错讹在庾仲雍写《荆州记》之前可能就已出现，庾仲雍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与郭璞的创作联系起来，遂演绎出“《游仙诗》嗟青溪之美”云云。

三 郭璞与丞相王导的关系及其为皇帝直接效命的机缘

郭璞初到江南，就以一个庶族出身的下层幕僚身份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所知并多次为皇帝占卜，地位如此悬殊，为皇帝所知如此之快，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究竟是什么机缘使得郭璞交此“好运”呢？对此，本传并没有交代，但此事对郭璞的人生十分重要，有必要揭示出被遮掩的史实。

郭璞得此机缘与丞相王导密不可分，这涉及郭璞与王导之间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除本传所提供的事实之外，郭璞写给王导的颂歌《与王使君诗》中透露了更为重要的信息，十分含蓄地反映出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

灵荫谬垂，跃我龙津。

① 《晋书·郭璞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六册第1899页。

② 《晋书·地理志》，第二册第454页。